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第六十一卷第三期

2016年，61(3)，163-195

doi:10.6209/JORIES.2016.61(3).06



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與轉換 對國中學生教育成就的影響

謝志龍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莊致嘉

國立東華大學
社會學系

摘要

過去相關研究探討文化資本議題時，多數僅就子代的學業成績或升學情況進行分析，這對理解文化資本在教育場域的再生產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依然缺乏具有說服力的證據。本研究認為，在解答文化資本對教育成就的效力之前，必須先釐清文化資本從親代傳承到子代的過程，才能進一步澄清文化資本對子女教育的影響。立基上述問題意識，本研究使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釋出的國中學生、家長及導師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父母可透過「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路徑」與「經濟資本的代間轉換路徑」將身體化與客體化的文化資本傳給下一代，進而展現在子代對高雅文化的善意。Bourdieu的文化再製論點對於臺灣教育場域的文化再製現象具有解釋力。然而，子代文化善意對子代在校表現與學術分流的效果卻未如預期：子代文化善意對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產生負面影響，對學術分流則無顯著效果。此結果可能來自臺灣教育制度過度重視智育表現，而子代文化善意的展現往往會分散學習者對智育表現的專注力與時間分配。臺灣獨特的教育環境使得子代內化後的文化資本對學業成就的效用有限。

關鍵詞：文化再製、文化資本、社會階級、教育成就

壹、緒論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再製論點是教育社會學和階層化研究者瞭解社會階級再製現象的重要理論依據，藉以探討文化資本與階級再製的關聯，例如檢視文化資本對子代學業表現、教育分流或學科成績的影響（引自李文益，2004；李文益、黃毅志，2004；張芳全，2006；許崇憲，2002；陳怡靖、鄭耀男，2000；DiMaggio, 1982; DiMaggio & Mohr, 1985; Kalmijn & Kraaykamp, 1996）。這些研究多發現家庭的文化資本會影響子代競逐稀少資源的機會和成就取得的結果。然而，當中的因果關係卻常認為是家庭具備高文化資本，導致子女的教育成就較高。這樣的解釋過度簡化家庭文化資本和子代成就地位之間連結的複雜性，忽略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代間移轉過程及不同形式資源的可轉換性，因而無法清楚說明文化資本究竟如何對教育成就產生影響。若能解開此一含混未明的機制將有助瞭解文化資本的真正效力。

本研究認為探討文化資本對教育成就的影響力之前，應先檢視文化資本如何從親代傳承至子代，才能進一步澄清文化資本對子代學業表現的作用。依據 Bourdieu 的理論，本研究認為父母可能透過兩條路徑幫助子代累積文化資本。第一是父母自身具備對文化資本的理解與認同，透過帶領子女參與各類文化活動來幫助子代瞭解高雅文化，進而讓子代累積對文化資本的親近與善意（goodwill），稱為「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路徑」。其理論意涵為 Bourdieu（1986）所討論的身體化文化資本（the embodied state），藉由親子共同參與文化活動而將親代在精神與身體上所蘊含的秉性形式「傳遞」為子代文化資本的過程。第二是家長透過家庭的經濟資本優勢投資子女參加各類才藝課程，培養子女對高雅文化的喜好與熟習，稱為「經濟資本的代間轉換路徑」。其學理依據為 Bourdieu 所論述的客體化文化資本（the objectified state），藉由父母購買文化課程而將親代所擁有的外在物質財貨「轉換」為子代文化資本的過程。在本研究中，若子女也如同父母一般具備對菁英文化的熟悉與認同時，即可視為文化資本已內化成功而傳遞或轉換為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稱之為「子代文化善意」。換言之，父母具備的文化資本會經由這兩條路徑「傳遞」和「轉換」為子代的文化資本，然後才對子代的教育成就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文化資本影響教育成就的討論著重於資本代間的「傳遞」和「轉換」之可能性，以及產生的結果。本研究使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合併國中學生、家長與導師等調查資料，首先分析文化資本代間「傳遞」和「轉換」此兩條路徑之效力，釐清不同社會階級的家庭資源差異。接著，探討內化後的子代文化資本對子代教育成就的影響，將資本「傳遞」和「轉換」的機制納入以往研究檢驗的文化資本和成就取得的因果模型中，嘗試勾勒文化資本對教育成就的運作機制。此研究結果將有助於提供一個經驗證據的支持，說明透過上述兩種路徑而來的文化資本對子代學業表現的

影響，進而檢視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再製論點對臺灣教育場域的有效性及其中更細膩的因果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Bourdieu 的文化資本再製論點

文化資本理論在量化研究過程仍有不少爭議。相關研究多涉及「如何對文化資本概念進行適切測量」與「文化資本是否真的再製社會不平等」之論辯（如謝志龍，2009；蘇船利、黃毅志，2009；De Graaf, 1986; Farkas, Grobe, Sheehan, & Shuan, 1990）。正因為如此，國內、外眾多的研究結果相當分歧，有支持文化資本效力者，也有持反對意見者。然而，本研究嘗試從另外一個角度反省文化資本的效力，研究者認為既有研究忽略 Bourdieu 的資本傳遞與轉換觀點。本研究將從文化資本的代間內化過程及其對國中學生教育成就的影響進行分析，據以檢視父母傳遞文化資本給下一代的路徑，以及子代文化資本對於教育成就的影響效果。

（一）文化資本對教育成就的影響

對 Bourdieu 而言，資本是交換系統中藉以獲得權力和地位的一種社會關係累積，它可延伸到所有稀少且值得追尋的物質性或象徵性商品；其中，涉及象徵性、非經濟性的社會關係積累就是文化資本（Barker, 2004）。文化資本最重要的特點是區別效力，上層階級經常藉由展現高雅文化品味，諸如生活風格、信仰與慣習等來區辨與其他階層的不同（Bourdieu, 1984）。因此，文化資本被定義為具備社會或文化排除、已經約定俗成、被形塑為高地位文化的廣泛符號（Bourdieu & Wacquant, 1992; DiMaggio & Useem, 1978; Lamont & Lareau, 1988）。

擁有豐富家庭文化資本的下一代一開始就占據先天之利，得以長期在家庭中累積豐碩的文化資本（Bourdieu, 1986）。更由於社會上層的精緻文化在學校中屬於主導文化，因而上層階級的學生經歷家庭環境的長期薰陶，在學校容易與教師有較佳的互動關係，教師對其課業學習給予較多關注、更深期望，學生將更容易獲得高分（Bourdieu, 1984）。換言之，高社經地位學生的家庭生活方式讓他們進入學校後相當容易熟悉學校的運作邏輯，有助學生入學後的表現，以及有利教師對學生的正面評價（Bourdieu & Passeron, 1977）。

依循 Bourdieu 的理論，多數研究都認為文化資本與學業成就具有正向關聯。DiMaggio（1982）證實在學校若僅有能力並不足以取得好成績，反而是文化資本明顯有利於學業表現；DiMaggio 與 Mohr（1985）的研究也支持文化資本對大學入學率、大學畢業率、繼續攻讀研究所的比率都具有助益；Kalmijn 與 Kraaykamp（1996）檢證學業成就與文化資本所連結的不平等問題，發現高地位文化與高學業成就之間有正向關係；一些國內研究也說明臺灣社會存在文化再製的現象，主張家庭背景透過文化資本作為中介變項而影響學童的教育成就取得（李文益，2004；李文益、黃毅志，2004；張芳全，2006；許崇憲，2002；陳怡靖、鄭耀男，2000）。

此外，既有研究也認為文化資本會影響學校對待學生的不同態度。研究發現，學生擁有的文化資本可能透過服裝儀容、行為舉止、提問方式等表現，影響教師對該名學生的評價（Farkas et al., 1990）；DiMaggio（1982）曾提出文化資本再製模型，認為出身高社經家庭的學生會透過代代相承文化資本而維持優勢，出身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在學校教育過程中將因缺乏文化資本而取得較低回饋；國內研究中，李文益（2004）、蘇船利與黃毅志（2009）等都發現文化資本愈高，師生關係愈佳。

（二）資本的「傳遞」與「轉換」

為了更清楚探討文化資本，Bourdieu（1986）將文化資本劃分為身體化、客體化及制度化狀態三種形式。

第一，身體化的文化資本。此種形式的文化資本與身體有關，是一種存在精神與身體上的稟性形式。積累的過程是行動者透過家庭環境獲得並成為精神與身體一部分的文化知識、技能和修養。此過程相當漫長，必須由投資者身體力行，無法透過餽贈、買賣和交換來傳遞；最終，展現在包括體態、姿勢、舉止儀表、交往行為、操作技能等形式的外顯。也因此，此種形式的文化資本存在社會階級的差異，取決於家庭擁有的文化資本，透過家長的日常生活方式與慣習，有意無意的、持續的將身體化狀態傳遞給下一代。實證研究中，經常使用「出席或參與高雅文化活動」代表行動者具備身體化的文化資本，高雅文化活動通常泛指歌劇、音樂會、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文化中心等與藝術相關的活動（李文益，2004；李文益、黃毅志，2004；巫有鎰，1999；張芳全，2006；許崇憲，2002；陳怡靖、鄭耀男，2000；黃芳銘、楊金寶，2002；DiMaggio, 1982; DiMaggio & Mohr, 1985; Dumais, 2002; Kalmijn & Kraaykamp, 1996; Orr, 2003; Roscigno & Ainsworth-Darnell, 1999）。

第二，客體化的文化資本。此種形式的文化資本藉由外在物質的客觀化狀態來展示，包括書籍、圖畫、辭典及工具等物質性文化財貨。其物質特性讓父母得以運用經濟資本購買文化財貨而轉換為下一代所具備的文化資本。不過，表面傳承的只是文化財貨的合法所有權，更關鍵的傳承法則是客體化狀態的物質性背後之符號意涵：藉由擁有客體化文化資本，彰顯出擁有者的身分與品味。Bourdieu（1986）對文化資本的討論相當重視這種資本轉換的概念，強調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之間進行不同形式的轉換。經濟資本是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形成和發展的根源，意即個人的財富、物質資源及擁有的生產工具設備等可以轉變為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而這兩種資本同樣可以還原為經濟資本。根據這樣的思考，我們能夠想像當擁有豐富的經濟資本，行動者可能透過其經濟實力購買、取得與文化資本相關的媒介，試圖讓下一代習得上階層文化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擁有經濟資本去購買文化財貨不見得等於懂得欣賞文化財貨，文化財貨應該與身體化的文化資本有關，藉由理解、認識該項文化產品的意義與價值，那麼擁有該項文化產品才可以說是具備生活風格與品味。國內、外文獻中，相當一致的都以「參與文化課程」與「家庭文化財貨」代表客體化的文化資本。文化

課程通常指學習各種才藝或補習，以參加才藝班或補習班來指涉文化資本，包括音樂、美術、書法、舞蹈、心算、珠算、電腦、作文、英語、數理等各類課程（李鴻章，2006；巫有鎰，1999；許崇憲，2002；黃芳銘、楊金寶，2002；劉正，2006；Dumais, 2002; Roscigno & Ainsworth-Darnell, 1999）；文化財貨則包括家庭裡的圖書、雜誌、報紙的數量，電腦、收音機、電視等影音設備，樂器、圖畫，甚至藝術品等（李鴻章，2006；巫有鎰，1999；張芳全，2006；許崇憲，2002）。

第三，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文化資本的制度化狀態，就是將個體掌握的知識與技能以某種形式展現，通常是以學術資格的方式被正式承認，透過考試、授予合格文憑或資格認定證書等社會公認的模式將其制度化。學術資格與文化能力的證書給予擁有者一種文化的、約定俗成的、具備合法保障的價值，隱含該擁有者這段期間內占有的文化資本，甚至也確立在勞動市場中進行交換的金錢價值。早期文化資本的相關研究，曾以父母親的教育程度作為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林松齡（1999）認為父母親教育程度愈高，愈可能對子女的學習內容提供適時的協助，例如為子女建議有用的書籍、選擇較好的學校就讀、為小孩閱讀、講解課本的內容；同時，也較可能為子女提供適當的學習條件與學習環境。

綜合上述三種文化資本的形式，本研究歸納出 Bourdieu 文化資本再製理論的兩條內化路徑。第一為「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路徑」，是從「身體化文化資本」的概念出發，立基家長身體化狀態對高雅文化的親近性，然後帶領子女參與蘊含上階層生活風格的文化活動，如音樂會、美術館與博物館等，引領下一代具備對文化資本的善意。其前提為家長本身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技能或修養，方得以帶領子女共同參與文化活動而將親代身體化狀態的文化資本「傳遞」為子代的文化資本。第二為「經濟資本的代間轉換路徑」，主要聚焦於客體化文化資本的概念，為家長使用家庭經濟資本購買具備上階層品位的文化財貨或音樂、美術、舞蹈等才藝課程，培養下一代對高雅文化之瞭解。此時，豐富的家庭經濟資本與理解客體化的文化資本是投資文化財貨與才藝課程的基礎，藉由足夠的經濟資源購買匹配其身分與品味的文化商品，將經濟資本「轉換」為物質性財貨而成為子代所擁有的文化資本。¹由於文化資本的多寡可具體展現在對上層精緻文化的親近性，一旦文化資本透過這兩條路徑傳遞或轉換給子女，且內化為子代的個人秉性時，代表子代已習得一定程度的品味與慣習而成為個人身體

¹ 此外，文化資本的制度化狀態（無論是合格文憑或資格證書等）展現於父母親的身上時，常見的判斷形式是父母親的教育程度（林松齡，1999）。林松齡解釋父母親教育程度愈高，愈可能為子女建議有用的書籍；為小孩閱讀、講解課本的內容；提供適當的學習條件與學習環境等。然而，本研究認為教育程度高或許文化資本也高，但並不意味著教育程度就是文化資本。當中的因果關係應該是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親，更可能具備某些獨占性的、有別於其他教育程度者的資源、知識或品味等，這些才是文化資本。根據此邏輯，本研究乃是將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視為家庭背景的變項之一，藉以探討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是否具備相匹配的親代與子代文化資本，以及此文化資本對於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效果。此時，合格文憑或資格證書所代表的制度化文化資本之影響力，應該被包含於代間「傳遞」與「轉換」此路徑之內。故本研究綜合上述三種文化資本的形式而歸納出 Bourdieu 文化資本再製理論為兩條內化路徑。

化的文化資本，本研究稱之為「子代文化善意」。換言之，菁英家庭的子女從出生後就接受家庭「傳遞」與「轉換」而來的各種文化資本，包括父母、親人的身體化資本如語言、行為舉止、價值觀、人格秉性等的薰陶，以及家庭環境使用各種客體化資本如圖書、繪畫、音樂等所產生的涵養，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長期輸送，對子女產生身教、言傳的結果。

（三）資本傳遞與轉換的文化再製邏輯

資本傳遞與轉換有重要的文化再製意涵。Bourdieu (1986) 認為資本形式的可轉換性是構成階級再製策略的基礎，當立基於經濟資本的依賴和支配關係經由轉換成被教育制度認可的文化資本時，將有助原本的優勢階級通過轉換來保證既有資本和地位的再製。當家庭的文化資本愈豐厚，這個積累的效能愈明顯，與其他家庭的差距愈大。於是，階級差異得以被延續與複製。在這種無形的、隱匿的文化資本輸送過程，家庭與教育場域共同實踐階級文化的再製。因此，本研究的價值不僅在找出家庭文化資本與子代教育成就之間的因果路徑，更重要的意義為釐清當中蘊含的文化再製過程，也就是親代擁有的文化資本是否與如何轉換成子代的文化資本？以及轉換後的子代文化資本對子代教育成就的影響效果？

二、社會階級與文化再製

文化資本的傳遞與轉換是階級再製的重要機制，所以檢視不同社會階級的文化資本差異也必須說明社會階級與資源分配的關係。具體而言，社會階級代表的是一種資源分配不平等，指稀少而有價值的資源在社會中不均等分配後所造成的固定等級地位（蘇國賢，2011）。關於社會階級的討論主要來自馬克思（Marx）和韋伯（Weber）學派的觀點，以及之後延伸的新馬克思和新韋伯學派的階級分類。

（一）社會階級分類

社會階層化研究領域存在一個傳統理論之爭，因為馬克思主義者與韋伯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階級及其政治後果做出不同的理論解釋（蔡瑞明，2008）。1945 至 1960 年代，這兩派爭論轉化為階級理論的功能論和衝突論分別對發達工業社會的階級做出對立解釋；迄今其後繼者仍致力於修正和發展，以使原有理論適應新的社會現象（Grusky, 2001）。新馬克思主義者延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化理論，針對中產階級現象提出兩種對立觀點。一派仍堅持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兩極分化看法，認為愈來愈多工人會被機器取代而去技能化和無產化，因此中產階級的中下層將落入工人階級隊伍，工人階級的相對規模將擴大；另一派則修正原有的兩極階級結構模式，認為新中間階層並未受到剝削，不能再視為工人階級，於是把中產階級納入階級分類框架（林宗弘，2009）。新韋伯主義者則依據韋伯的社會封閉概念，認為社會群體會以壟斷手段設置並強化其成員資格來最大化自身群體利益，這種巨視結構層面運作的排斥性過程將導致階級和地位團體的產生（Grusky, 2001）。表面上當代工業社會並不存在某種正式制

度禁止就業者跨越階級邊界進行流動，但實際上存在各種制度力量限制人們的代間和代內社會流動，這正是社會封閉機制的的作用。

一般而言，社會階層化研究的發展與社會變遷方向有所關聯。臺灣在 1987 年解嚴後，社會階級結構有明顯快速上升流動的趨勢，導致勞工與中產階級研究開始興盛（蔡瑞明，2008）。諸如農業人口隨都市化與工業化的腳步迅速消失，勞工與中產階級應運而生，以及有一定比例的自營業者、中小企業主選擇自行創業，都是臺灣經濟快速起飛階段的重要議題。此時期，新馬克思與新韋伯主義的階級結構劃分標準，也就是透過不同職業類型來決定家庭或個體在分配不平等階梯中歸屬的社會位置，據以探討不同位置隱含的資源分配、生活方式與政治影響力之差別，成為 1980 年代階層化學者研究時的重要思考方式。1990 年代開始，隨著教育擴張與教育改革的啟動，眾多學者紛紛投入教育階層化研究（蔡瑞明，2008）。這些研究主要是使用地位取得模型的分析取向，檢驗社會階層與教育成就的關聯。其中，父母的教育、職業與收入經常是代表社會階層的指標，特別是職業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決定家庭主要的生活方式、可用的經濟資本、看待事物的價值判斷，以及與子女互動的方式等（黃毅志，2008）。晚近，蘇國賢（2008）採用新韋伯學派學者 Erikson 與 Goldthorpe 所發展的階級分類架構，將臺灣社會分成六個階級（專業、行政、自營、務農、技術工、非技術工）並觀察其變遷，研究發現產業與職業結構的變化是影響階級結構的重要因素，其中最明顯的變化是務農、非技術、自營階級的比例持續下降，而專業、行政、技術階級則逐年成長，且在 1990 年代進入成熟的工業化社會後，階級結構已呈現相對穩定的狀態。林宗弘（2009）根據臺灣官方統計數據與 1992 至 2007 年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樣本，以新馬克思主義者 Wright 的階級類型劃分七個階級（非技術工人、自營作業者、專家／技術工人、經理人、專業經理人、小雇主、資本家），研究發現，過去近 20 年間臺灣的階級結構發生相當大的轉變，自僱者與無酬家屬勞動者快速減少、專業技術人員擴張、黑手變頭家與「頭家娘」現象則在消逝中。此外，林宗弘也發現父母的階級位置對子女階級繼承的影響有限，階級流動愈來愈依賴文化資本的代際傳遞。所以，即使社會的階級結構面臨變遷，但不同職業所擁有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之差異始終是區辨階級的重要依據。

（二）不同社會階級的文化資本傳遞與轉換

隨著產業結構轉型及教育持續擴張，臺灣整體社會結構變遷產生資源分配機會的改變和提高階級流動的可能性。黃毅志（2011）曾指出臺灣社會以往存在兩種向上流動管道：一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是透過取得高教育成就而獲得高職業地位、高收入之類的工作機會；二是「黑手變頭家」，泛指低教育的受僱民眾藉由自行創業而變成小頭家。在這個競逐向上流動機會的過程中，若結合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再製論點，本研究認為，文化資本可能成為一種工具或手段，父母能夠藉由資本的傳遞與轉換以幫助子女跨越階層藩籬的界線。

特別是在華人社會裡，透過教育晉升階級是多數父母對子女的期盼（謝志龍，2014）。這

種期待反映出的具體實踐經常是父母積極投資子女各類的教育資源。此時，不同社會階級的父母，例如擁有生產工具的大老闆、具備高度專業的專門技術職業人士，或者低薪的體力勞動者，由於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差異，他們針對子女文化資本之投注與養成的過程未必相同。因此，本研究嘗試提問：不同階級位置的家長所蘊含之文化資本是否和如何成功地傳遞與轉換為子代的文化善意？以及此結果是否有助子女取得高教育成就？本研究將藉由一系列的實證分析回答上述問題。

參、研究設計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資料來源是 TEPS。TEPS 由中央研究院、國科會和教育部共同規劃，是關於臺灣青少年教育歷程的大型資料庫，運用固定樣本長期追蹤的方式，於 2001 年訪問國中一年級學生計 13,978 人，並在 2003、2005 與 2007 年進行追蹤。受訪對象除國中生本人，也包括學生家長與教師等。此種豐富、貫時且完整的大型資料庫適合本研究探討的議題。該資料庫的問卷設計、抽樣訪問、過錄整理等資料蒐集過程皆十分嚴謹，在相關研究中廣泛被運用，也累積大量與高品質的學術研究成果。

本研究合併 TEPS 國中學生、家長與導師等問卷。TEPS 的學生、家長、教師問卷是在相同架構之下的設計，因此 TEPS 相當重視不同問卷之間的關聯設計，以及各問卷間的對話關係（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2004）。如此的設計有助於研究者藉由受訪者代碼合併三份問卷，並經由問卷間的互補及交叉詢問以分析彼此相關聯的題項。其中，本研究最主要的資料來自 2001 年第一波訪問的國一學生樣本，有效樣本共計 10,733 人；以及這群受訪者在 2005 年就讀高二時再次被追蹤的第三波訪問資料，有效樣本尚有 2,457 人。這些受訪學生出身不同家庭、具有相近年齡，充足樣本數與豐富變項可支持本研究進行多變量分析與較複雜的模型檢證。

二、社會階級的操作化

階層化研究者經常使用的職業分類，以黃毅志在 1998 年發展的「五等職業社經地位測量」及 2003 年重新建構的「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最普遍。前者將職業區別為主管及專業人員、助理專業人員及技術員、事務性工作人員、買賣服務及技術工、農林漁牧及非技術工等五類，並由高而低劃分為五等職業社經地位（黃毅志，1998）；後者則以五等職業社經地位測量的架構為基礎再分成九類職業，並賦予相對應的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黃毅志，2003，2008）。上述的分類方式比較接近新韋伯學派的觀點，根據職業內容而區分成不同的職業類別，並建構其中的階級排序。但由於 2001 年版 TEPS 關於職業的問卷題目有些瑕疵，職業分類問項中少了主管人員、農林漁牧人員，有可能造成重要的父親職業對依變項的影響效

果偏誤，²本研究因此不採用這種分類標準。此外，本研究必須區隔不同階級擁有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差異，以及資本傳遞和轉換的現象與效果，契合特定理論框架（即擁有生產工具、管理權威與專業技術）而把個人或家庭區分為各種排他性類別的新馬克思學派會比較合適。所以，本研究採用新馬克思學派的階級分類，參考林宗弘（2009）的架構，根據父親是「老闆或非老闆」、「主管或非主管」與「有技術或無技術」三個標準，綜合使用 TEPS 問卷中的三個題目（是否為負責人或老闆、在工作單位中的職位、職業類別）而操作如下。

本研究依據「生產工具的有無」將受訪者中的雇主與受僱者分開。雇主類目依據「權威的高低」分為資本家（僱用人數 10 人以上，雇主、高權威）、小雇主（僱用一至九人，雇主、低權威）與小資產階級（即未僱人的自營作業者，雇主、無權威）。³受僱者類目依據「權威」（指是否有管理別人）⁴與「技術層級」（需通過考試或具備證照）分為四類，分別是非技術工人（無技術、無權威）、專家與技術工人（有技術、無權威）、經理人與領班（無技術、有權威），以及專業經理人（有技術、有權威）。最後，定義出七類社會階級位置，整理如圖 1 所示，分別是：(1)資本家；(2)小雇主；(3)小資產階級；(4)專業經理人；(5)專家與技術工人；(6)經理人與領班；(7)非技術工人。由於此七類是藉由生產工具、權威與技術三者理論意涵交互作用而得，其意義為受訪者父親所歸屬的階級位置，但各位置類屬之間並不全然為連續性、次序性的概念。

雇主	受僱者			
(1)資本家	(4)專業經理人		(6)經理人	高權威
(2)小雇主 (<10)			與領班	低權威
(3)小資產階級 (自營作業者)	(5)專家 與技術工人		(7)非技術工人	無權威
	專業	技術	無技術	

圖1. 本研究的七類社會階級位置分類。修改自「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林宗弘，2009，*臺灣社會學刊*，43，p. 110。

² TEPS 詢問受訪者父母職業的選項如下：(1)各級學校教師（包括幼兒教育）；(2)政府公務人員（含軍警人員）；(3)律師、法官、醫師、工程師、會計師；(4)其他專業與技術人員（需學位或證照等）；(5)一般事務或業務人員（如助理或秘書等）；(6)買賣或服務工作人員；(7)生產、設備操作及體力工（如工廠作業員工等）；(8)其他職業；(9)從來沒有工作過。

³ 「僱用人數的設定」乃是依據 TEPS 的問卷設計。林宗弘（2009）的研究將小雇主的界線設定為僱用八人，但他也指出從數據本身來看，八人與 10 人的差異其實非常輕微。

⁴ 「是否有管理別人」同樣是依據 TEPS 的問卷設定。其中，高級主管為高權威，中級與基層主管為低權威，非主管職為無權威。

三、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

首先分析文化資本的兩條內化路徑，即「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路徑」與「經濟資本的代間轉換路徑」在不同階級的差異。前者是指家長基於自身對菁英文化的親近而帶領子女參與文化活動，後者指家長使用家庭經濟優勢投資子女參加才藝課程。本研究預期不同階級的家庭會採取不同路徑去幫助子代累積文化資本：擁有高文化資本的家長，認同上階層的文化品味與慣習、也瞭解文化資本的重要，因而會積極帶領子女參與高雅文化活動；至於具備較多經濟資本的家長，因擁有豐富金錢而得以投資子女參加才藝補習，較可能花費更多經濟資本以購買文化財貨給子女。據此，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一 A：文化資本愈高的社會階級，家長帶領子女參與高雅文化活動的頻率愈高。

假設一 B：經濟資本愈多的社會階級，家長投資子女參加才藝文化課程的程度愈多。

接著探討不同社會階級能否成功傳承文化資本給下一代。由於文化資本的多寡可具體展現在對上層精緻文化的親近性，因此本研究聚焦身體化狀態的文化資本概念，這是一種藉由行動者身體與精神所展現的、外顯的生活習慣、品味與風格。稱為子代文化善意，它產生於子女也認同上階層的品味與慣習，這是文化資本內化成為個人秉性的展現。據此，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二 A：家長帶領子女參與高雅文化活動，有助於傳遞文化資本為子代的文化善意。

假設二 B：家長投資子女參加才藝文化課程，有助於轉換文化資本為子代的文化善意。

本研究進一步釐清文化資本對子代教育成就的效果，檢驗子代文化善意對在校表現（指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及教育分流的影响力。

在綜合能力方面，其意義為受訪者經施測所得的綜合學科能力。多數研究認為文化資本與學業成就具有正向關聯（李文益，2004；李文益、黃毅志，2004；張芳全，2006；許崇憲，2002；陳怡靖、鄭耀男，2000；DiMaggio, 1982; DiMaggio & Mohr, 1985; Kalmijn & Kraaykamp, 1996）。然而，上述研究討論的文化資本應稱為「親代」或「家庭」的文化資本，這種研究設計忽略本研究關懷的文化資本傳遞與轉換之概念。本研究認為，即使親代文化資本有助子代教育成就的取得，但當中的機制可能是資本成功傳遞與轉換後的結果。亦即，當文化資本成功為子女內化且以文化善意的方式外顯，才會有助學業方面的表現。據此，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三 A：子代的文化善意愈高，該學生在學校達成的綜合能力分數愈高。

在導師評量方面，既有研究認為文化資本會影響學校對待學生的不同態度（李文益，

2004；蘇船利、黃毅志，2009；Bourdieu & Passeron, 1977；DiMaggio, 1982；Farkas et al., 1990）。這些研究結果意謂家庭是決定文化資本的重要場所，學生只是將已習得的文化資本攜帶到學校裡，且被教師評價而已。此時，子女內化的文化資本愈豐富，愈有助於教師的評價。據此，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三 B：子代的文化善意愈高，該學生獲得學校導師的評量分數愈高。

在教育分流方面，教育分流的目的是希望因材施教，使學生接受學術與技職不同課程之教學，但分流結果卻影響未來的教育、職位與收入（李佩嫻、黃毅志，2011；林大森，2002）。其中，學術分流者的未來教育、職業地位取得機會優於進入技職分流者（黃毅志，2011）。臺灣高中聯考的最後一屆是 2000 年，2001 年起正式實施多元入學，主要透過申請入學、甄選入學與登記分發入學三個管道（陳怡靖、黃毅志，2011）。⁵但多元入學其實還是深受在學時的學業表現、教師打分數與指導態度及推薦函，以及基測成績的影響（謝志龍，2014）。在學科能力方面，當學生成績愈好，應該愈容易跨越多元入學門檻而進入學術分流；在導師評量方面，當教師對學生能力評價愈高，學生易得到愈多關注、師生互動頻率增加，同時教師評量學生的分數、指導學生的態度，以及推薦函的內容與強度也都可能更為正面，有助提升多元入學的競爭力。據此，本研究預期子代文化善意將藉由在校表現作為中介機制，進而影響學術分流的機率。

假設四 A：子代的文化善意愈多，其綜合能力分數愈高，進而導致教育分流時選擇學術分流的機會愈大。

假設四 B：子代的文化善意愈多，其導師評價分數愈高，進而導致教育分流時選擇學術分流的機會愈大。

根據上述的研究假設，繪製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

四、依變項測量

（一）學術分流與否

本研究關注的教育分流為選擇升學與技職之區別。此變項以 TEPS 第三波課程類別為分類依據，分為學術分流（包括普通學程自然組、非自然組、自然組與社會組混合，綜合學程學

⁵ 臺灣在 2014 年 8 月起延長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並且以「教育會考」取代「國中基測」；此外，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乃是使用「多元學習表現」的採計原則（宋曜廷、周業太、曾芬蘭，2014）。但由於本研究的受訪者所經歷教育制度為多元入學，故本研究的討論仍以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多元入學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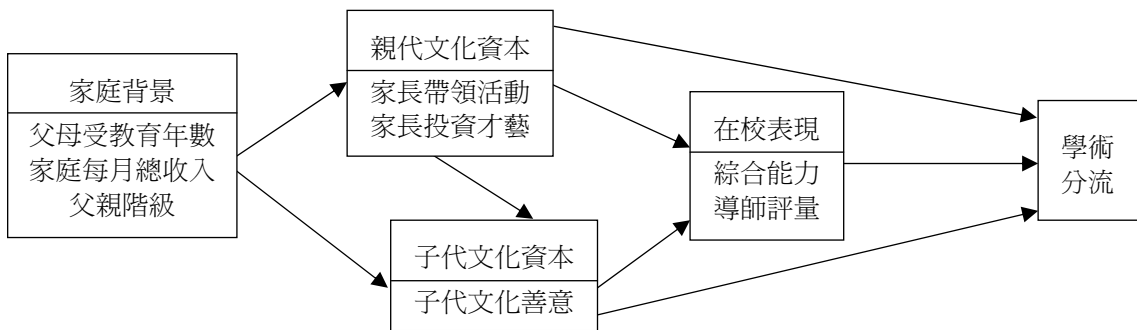


圖2. 因果模型

術導向，以及高職學程普通科）與技職分流（包括綜合學程非學術導向，高職學程的工、商、海事水產、家事、農及藝術類，以及五專學程的理工、文商、醫）。學術分流設定為 1，代表受訪學生選擇繼續升學；技職分流設定為 0，代表受訪學生學習一技之長。以技職分流（即非學術分流）為對照組。

（二）綜合能力分數

係 TEPS 第一波訪問時針對受訪學生蒐集的能力分數。此測驗目的在瞭解學生的學習能力、思考及解決問題的分析能力。檢測範疇包括一般分析、數學、語文及科學等測驗，依據答對題數轉換成具鑑別力的三參數的 IRT (item response theory) (3PL) 模式（楊孟麗、譚康榮、黃敏雄，2003）。此變項的分數範圍從-2.84 至 2.85，分數愈高代表綜合能力值愈高。這些測驗分數是一種用來衡量潛在能力的心理計量方法，其單位尺度比較的是不同自變項對 IRT 分數的相對影響力（蘇國賢、喻維欣，2007）。依據綜合能力分數的高低，可以有效判斷受訪者擁有的學科能力。

（三）導師評量分數

指 TEPS 第一波訪問時受訪者國一導師評量受訪者能力的分數，評量指標包括受訪者的口語表達、寫作報告、團隊合作、資料蒐集與整理、邏輯思考等，這些能力並非是學業成就分數，而是受訪學生在班級裡表現的個人特質，被教師評價的能力表現。依能力強弱分別得 0 至 5 分。共計五個題目，總得分範圍為 0 至 25 分，分數愈高代表導師對受訪者能力的評價愈高。

（四）家長帶領活動

本研究認為家長必須親近或認同上階層的高雅文化，才會帶領子女參與相關文化活動。故此變項係合併國中家長問卷的題目「(子女上國小時) 您或您的配偶是否和他一起逛書店、書展或各種展覽」與「(子女上國小時) 您或您的配偶是否和他一起去聽古典樂、觀賞舞蹈或

戲曲表演」而得。從來沒有=0分、偶爾如此=1分、有時如此=2分、經常如此=3分。共計兩個題目，總得分範圍為0至6分，分數愈高表示父母愈頻繁帶領子女參與高雅文化活動。

（五）家長投資才藝

指父母投資子女參加文化才藝課程的程度，將國中家長問卷的題目「(子女上國小時)您或您的配偶是否曾讓他參加才藝班(如音樂樂器、繪畫美術、舞蹈體操)，以及國中學生問卷的題目「(升國中的暑假)您是否參加了才藝班(如音樂、繪畫、舞蹈)」進行合併。父母進行此類投資時須支付學費，因此該變項可視為是使用經濟資本轉換為文化資本的指標。若有得1分，若無得0分。共計兩個題目，總得分範圍為0至2分，數字愈大代表父母投資愈多經濟資本給予子女參加才藝課程。

（六）子代文化善意

指子代主動參與文化活動而展現出對高雅文化的親近性程度。當子女在沒有父母帶領的情形下依然主動參與相關文化活動，反映文化資本已內化成為個人的品味與慣習。故此變項係結合國中學生問卷「從開學到現在，您是否經常聽古典樂、觀賞舞蹈或戲曲表演」與「從開學到現在，您是否經常參觀美術展、藝文展覽或博物館」等題目。沒有=0分、偶爾=1分、有時=2分、經常=3分。共計兩個題目，總得分範圍為0至6分。分數愈高代表子女對高雅文化活動的親近性程度愈高，其內化的文化善意愈明顯。

五、操作變項與控制變項測量

（一）操作變項：家庭背景

1. 父親受教育年數：使用受訪者父親的最高教育程度轉換成受教育年數，數字愈大代表父親教育程度愈高。

2. 母親受教育年數：同父親教育程度變項的處理方式。

3. 家庭每月總收入：以受訪者家庭的每月總收入為標準，根據 TEPS 設定的各組選項取中間值，2萬元以下為1(占7.2%)；2至5萬元為3.5(占40.1%)；5至10萬元為7.5(占37.6%)；10至15萬元為12.5(占9.8%)；15至20萬元為17.5(占3.0%)；20萬元以上為20(占2.3%)。約47%的受訪者家庭收入集中在5萬元以下，僅5%高於15萬元。為了降低所得分配的差異程度，以更明顯地反映低收入家庭所得情形，並減輕極端高收入者帶來的預測誤差，本研究依據上述金額取對數。

4. 父親階級：參考林宗弘(2009)運用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類，將 TEPS 家長問卷中「您現在是否為負責人或老闆」、「您在工作單位中的職位」與「您的職業類別」等三題，歸類為資本家、小雇主、小資產階級、專業經理人、專家與技術工人、經理人與領班、非技術工人等七類社會階級位置。以資本家為對照組。

(二) 控制變項

1. 男性：男=1、女=0，以女性為對照組。
2. 學校區位：依學校所在地的都市化程度分為都市、城鎮與鄉村。以教育資源相對豐沛的都市為對照組。
3. 家庭型態：與父母同住的家庭型態為完整家庭，父母中有一人不與受訪者同住者為單親或分居家庭，父母均不與受訪者同住者為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以家庭功能充分發揮作用的完整家庭為對照組。
4. 兄弟姊妹數：指受訪者以外的手足數。手足數愈多代表兄弟姊妹愈多，手足間的資源競爭與稀釋的情形愈嚴重。
5. 族群：分成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類，以閩南為對照組。

肆、研究分析

一、文化資本「傳遞」與「轉換」的階級區別效果

本研究第一個假設認為文化資本的兩條代間內化路徑在不同社會階級具有差異。為檢定此假設，首先比較父母教育、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在不同社會階級的差異，資料整理如表 1 所示；接著以線性迴歸考驗不同階級位置對親代文化資本的影響，整理如表 2 所示。

(一) 父母教育、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在不同社會階級的差異

在家庭經濟資本方面，家庭每月總收入（無論是否取對數）由高至低依序為：(1)資本家 > (4)專業經理人 > (2)小雇主 > (5)專家與技術工人 > (6)經理人與領班 > (3)小資產階級 > (7)非技術工人。在親代的文化資本方面，各階級位置的家長帶領活動與家長投資才藝相近，由高至低依序為：(4)專業經理人 > (1)資本家 > (5)專家與技術工人 > (2)小雇主 > (6)經理人與領班 > (3)小資產階級 > (7)非技術工人。綜合觀察此兩者，可發現專業經理人的文化資本高於資本家但經濟資本低於資本家，以及專家與技術工人的文化資本高於小雇主但經濟資本低於小雇主。根據此結果，本研究認為家長「擁有生產工具」及「具備專門技術」是促成家庭經濟資本與親代文化資本優勢的共同原因。但擁有生產工具對累積經濟資本的效果較強，例如資本家與小雇主的經濟資本較高；而具備專門技術則優先作用於文化資本的存量，例如專業經理人、專家與技術工人的文化資本較高。而當兩者皆不具備時，例如非技術工人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均最低。

若納入父母教育程度進一步觀察時，發現不同階級位置所擁有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是「父母教育程度與親代文化資本偏高，家庭收入居於中等，其子女文化善意也較高」的類型，以專業經理人、專家與技術工人屬之。此可能是親代文化資本豐富

表 1

不同階級位置在父母教育、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比較平均數分析

父親階級	教育程度		經濟資本		文化資本			N
	父親教育 (年)	母親教育 (年)	家庭每月 總收入 (萬元)	家庭每月總 收入取對數 (萬元)	家長 帶領 活動	家長 投資 才藝	子代 文化 善意	
(1) 資本家	12.94 (2.55)	12.50 (2.19)	11.21 (5.51)	2.67 (0.60)	2.38 (1.42)	1.12 (0.66)	1.88 (1.89)	376
(2) 小僱主	12.24 (2.28)	11.87 (2.12)	8.79 (4.90)	2.01 (0.61)	2.13 (1.34)	0.98 (0.63)	1.86 (1.95)	1,067
(3) 小資產階級	11.20 (2.05)	11.03 (1.92)	5.72 (3.26)	1.56 (0.63)	1.77 (1.25)	0.81 (0.64)	1.56 (1.83)	2,060
(4) 專業經理人	14.35 (2.31)	13.23 (2.22)	9.16 (4.16)	2.11 (0.49)	2.57 (1.38)	1.11 (0.62)	2.00 (1.89)	1,252
(5) 專家與技術 工人	13.37 (2.40)	12.53 (2.27)	7.26 (3.58)	1.85 (0.55)	2.31 (1.41)	0.99 (0.66)	1.98 (1.93)	1,059
(6) 經理人與領 班	12.29 (2.43)	11.66 (2.15)	7.00 (4.08)	1.78 (0.61)	2.05 (1.28)	0.91 (0.65)	1.58 (1.77)	1,475
(7) 非技術工人	10.58 (1.85)	10.45 (1.77)	4.35 (2.68)	1.28 (0.65)	1.57 (1.22)	0.65 (0.64)	1.51 (1.82)	3,444
η^2	0.26***	0.18***	0.22***	0.22***	0.07***	0.06***	0.01***	

註：表格內的數值為平均數，括弧內的數值為標準差，加灰底代表該類目的平均數最高。

*** $p < .001$.

而家庭經濟資本相對略低的情形下，家長使用既有的高文化資本及中等的經濟資本而嘗試讓子代延續既有高文化善意的文化資本代間傳遞情形。第二是「父母教育程度和文化資本略低於專業經理人、專家與技術工人，但擁有較高的家庭收入優勢，其子女的文化善意居中」的類型，以資本家與小僱主為代表。此可能是擁有豐沛經濟資本的前提下，家長對於上層精緻文化也具有一定的認同，因而使用高經濟資本嘗試轉換為子代高文化善意的情形。第三是「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親代文化資本及子代文化善意都偏低」的類型，以經理人與領班、小資產階級、非技術工人屬之。這些具有相對劣勢家庭背景的階級位置，在缺乏家庭經濟資本與親代文化資本的支持下，親代帶領子女接觸上階層精緻文化的程度較低，家庭經濟資本也較少用於投資子女才藝課程。此時，資本傳遞或轉換給下一代的路徑無法運轉，其子女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將會與親代同樣匱乏。

表 2

影響親代文化資本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摘要 (N=10,732)

	家長帶領活動		家長投資才藝	
	模型1		模型2	
	B	β	B	β
男性 (對照女性)	-0.19	-.07***	-0.20	-.15***
學校所在地 (對照都市)				
城鎮	0.05	.02	-0.02	-.01
鄉村	-0.00	.00	-0.02	-.01
家庭結構 (對照完整家庭)				
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0.23	-.04***	-0.10	-.03***
單親或分居家庭	-0.13	-.03**	-0.04	-.02*
兄弟姊妹數 (即家長生育子女數)	-0.09	-.08***	-0.02	-.04***
族群 (對照閩南)				
客家	-0.03	-.01	-0.03	-.02
外省	-0.02	-.01	-0.05	-.02*
原住民	0.12	.02	0.01	.00
父親受教育年數	0.07	.13***	0.03	.11***
母親受教育年數	0.12	.20***	0.05	.17***
家庭每月總收入 (取對數)	0.12	.06***	0.11	.12***
父親階級 (對照資本家)				
小雇主	-0.04	-.02	-0.02	-.02
小資產階級	-0.08	-.07**	-0.03	-.06**
專業經理人	0.00	.00	-0.02	-.03
專家與技術工人	-0.01	-.02	-0.02	-.04*
經理人與領班	-0.02	-.04	-0.01	-.05*
非技術工人	-0.04	-.10***	-0.02	-.12***
Constant	.01		.00	
R^2		.17		.17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二) 影響家長帶領活動與家長投資才藝的因素

表 2 模型 1 探討影響家長帶領子女參加高雅文化活動的因素，此模型可解釋家長帶領活動的變異量為 17%，達顯著的變項依預測力由高至低為母親受教育年數 ($\beta = .20$)、父親受教育年數 ($\beta = .13$)、非技術工人 ($\beta = -.10$)、兄弟姊妹數 ($\beta = -.08$)、男性 ($\beta = -.07$)、小資產

階級 ($\beta = -.07$)、家庭每月總收入取對數 ($\beta = .06$)、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beta = -.04$)、單親或分居家庭 ($\beta = -.03$)。若聚焦父親階級位置，資料顯示小雇主、專業經理人、專家與技術工人、經理人與領班等家長帶領活動與對照組資本家並無明顯差別，但教育程度和經濟資本都偏低的小資產階級與非技術工人的家長帶領活動則顯著低於資本家。

表 2 模型 2 是探討影響家長投注資源於子女才藝課程的因素，此模型可解釋家長投資才藝 17% 的變異量。具預測力的變項由高至低為母親受教育年數 ($\beta = .17$)、男性 ($\beta = -.15$)、非技術工人 ($\beta = -.12$)、家庭每月總收入取對數 ($\beta = .12$)、父親受教育年數 ($\beta = .11$)、小資產階級 ($\beta = -.06$)、經理人與領班 ($\beta = -.05$)、兄弟姊妹數 ($\beta = -.04$)、專家與技術工人 ($\beta = -.04$)、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beta = -.03$)、外省 ($\beta = -.02$)、單親或分居家庭 ($\beta = -.02$)。當觀察父親階級位置的影響作用，發現小雇主、專業經理人的家長投資才藝與對照組資本家沒有差別，但專家與技術工人、經理人與領班、小資產階級、非技術工人等家長投資才藝的程度都低於資本家。這表示經濟資本豐厚的資本家讓子代參加更多才藝課程。

綜上所述，假設一 A「文化資本愈高的社會階級，家長帶領子女參與高雅文化活動的頻率愈高」與假設一 B「經濟資本愈多的社會階級，家長投資子女參加才藝文化課程的程度愈多」都獲證實。首先，文化資本較高的前五個階級位置（專業經理人、資本家、專家與技術工人、小雇主、經理人與領班）帶領子女參與高雅文化活動的頻率都沒有差別而高於文化資本倒數的兩個階級（小資產階級與非技術工人）。再者，經濟資本前三名的階級位置（資本家、專業經理人、小雇主）投資子女參加才藝文化課程的情形也相當一致而多於經濟資本後四名的階級（專家與技術工人、經理人與領班、小資產階級、非技術工人）。此結果支持親代文化資本的傳遞與轉換此兩條路徑會因社會階級而有差異。

二、文化資本「傳遞」與「轉換」對子代文化善意的影響

表 3 模型 3 至 6 以子代文化善意為依變項，探討影響子代內化文化資本的因素。模型 3 為控制變項模型，模型 4 是控制各變項以檢視文化資本傳遞與轉換對子代文化善意的作用。模型 5 與 6 則是父親階級與家長帶領活動相乘、父親階級與家長投資才藝相乘的互動項模型，藉以在相同比較基礎上探索各階級投入不同家長帶領活動頻率、家長投資才藝程度的情形下對子代文化善意的效果。

模型 3 顯示父親階級位置對子代文化善意無顯著影響，代表各階級的子代文化善意與對照組資本家的子女沒有差別，其他達顯著的變項是母親受教育年數 ($\beta = .08$)、男性 ($\beta = -.07$)、父親受教育年數 ($\beta = .07$)、家庭每月總收入取對數 ($\beta = .03$)。當投入家長帶領活動 ($\beta = .13$) 與家長投資才藝 ($\beta = .16$) 後，模型 4 整體解釋力提高 4%，此兩變項的預測力遠高於其他變項，並造成原本顯著變項的效果減弱甚至消失，說明家長帶領活動與家長投資才藝是影響子代文化善意的重要因素。最後，模型 5 與 6 的互動項都未達顯著，此互動項可

表 3

影響子代文化資本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摘要 (N=10,732)

	子代文化善意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B	β	B	β	B	β	B	β
男性 (對照女性)	-0.25	-.07***	-0.13	-.04***	-0.13	-.04***	-0.13	-.03***
學校所在地 (對照都市)								
城鎮	0.04	.01	0.03	.01	0.03	.01	0.03	.01
鄉村	-0.04	-.00	-0.03	-.00	-0.03	-.00	-0.03	-.00
家庭結構 (對照完整家庭)								
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0.16	.02	0.24	.03**	0.24	.03**	0.24	.03**
單親或分居家庭	0.06	.01	0.10	.02	0.10	.02	0.11	.02
兄弟姊妹數	0.03	.02	0.05	.03**	0.05	.03**	0.05	.03**
族群 (對照閩南)								
客家	-0.03	-.01	-0.01	-.00	-0.01	-.00	-0.01	-.00
外省	-0.03	-.01	-0.01	-.00	-0.01	-.00	-0.01	-.00
原住民	-0.02	-.00	-0.05	-.00	-0.04	-.00	-0.04	-.00
父親受教育年數	0.05	.07***	0.02	.03*	0.02	.03*	0.02	.03*
母親受教育年數	0.07	.08***	0.02	.03*	0.02	.03*	0.02	.03
家庭每月總收入 (取對數)	0.09	.03**	0.02	.01	0.02	.01	0.02	.01
父親階級 (對照資本家)								
小雇主	0.04	.01	0.06	.02	0.02	.01	0.01	.01
小資產階級	-0.03	-.02	-0.00	-.00	0.02	.01	0.02	.02
專業經理人	0.01	.01	0.01	.01	-0.02	-.01	-0.01	-.01
專家與技術工人	0.03	.02	0.04	.03	0.04	.03	0.03	.03
經理人與領班	-0.03	-.03	-0.02	-.02	-0.03	-.04	-0.01	-.02
非技術工人	-0.01	-.02	0.01	.02	0.02	.04	0.03	.04
家長帶領活動 (I)	—	—	0.18	.13***	0.19	.14**	0.18	.13***
家長投資才藝 (II)	—	—	0.45	.16***	0.45	.16***	0.49	.18**
父親階級 × (I)或(II)					父親階級×I		父親階級×II	
小雇主 × (I)或(II)	—	—	—	—	0.02	.01	0.05	.02
小資產階級 × (I)或(II)	—	—	—	—	-0.01	-.02	-0.03	-.02
專業經理人 × (I)或(II)	—	—	—	—	0.01	.02	0.02	.02
專家或技術工人 × (I)或(II)	—	—	—	—	-0.00	-.01	0.00	.00
經理人或領班 × (I)或(II)	—	—	—	—	0.01	.02	-0.00	-.01
非技術工人 × (I)或(II)	—	—	—	—	-0.01	-.03	-0.02	-.04
Constant	.31		.30		.29		.27	
R ²		.03		.07		.07		.07

*p < .05. **p < .01. ***p < .001.

解釋為子代文化善意在不同階級位置的條件下，家長帶領活動或家長投資才藝每增加一個單位，對子代文化善意的影響效果之變化。一方面，由於家長帶領活動與家長投資才藝皆達正向顯著，代表各階級都會因投入家長帶領活動或家長投資才藝而提高子代文化善意；另一方面，由於互動項未達顯著，顯示不同階級的子代文化善意不會因投入家長帶領活動或家長投資才藝而有差別。

據此，本研究假設二 A 與二 B 也獲得證實：家長帶領子女參與高雅文化活動，有助於傳遞文化資本為子代的文化善意；家長投資子女參加才藝文化課程，也有助於轉換文化資本為子代的文化善意。且家長投資才藝對內化文化資本為子代文化善意的效果大於家長帶領活動。綜合言之，透過代間傳遞與轉換此兩條路徑確實有助將親代文化資本傳承給子女並內化為子代文化善意。

三、文化資本對子代教育成就的影響

本研究也釐清子代文化善意對子代教育成就的影響。資料整理如表 4 與 5 所示，依變項分別是綜合能力分數（模型 7 與 8）、導師評量分數（模型 9 與 10）及教育分流（模型 11 至 13）。由於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為連續變項，故以線性迴歸考驗研究假設；教育分流則分為升學與技職兩類，故以邏輯迴歸進行考驗。

（一）文化資本對綜合能力的影響

表 4 模型 7 顯示整體模型共可解釋綜合能力分數的變異量為 25%。達顯著變項由高而低為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beta = -.17$ ）、母親受教育年數（ $\beta = .15$ ）、父親受教育年數（ $\beta = .14$ ）、兄弟姊妹數（ $\beta = -.10$ ）、單親或分居家庭（ $\beta = -.10$ ）、原住民（ $\beta = -.09$ ）、家庭每月總收入取對數（ $\beta = .09$ ）、鄉村（ $\beta = -.05$ ）、城鎮（ $\beta = -.04$ ）、客家（ $\beta = -.03$ ）、男性（ $\beta = -.03$ ）、外省（ $\beta = -.02$ ）。然而，父親階級位置卻未達顯著，也就是各個階級的子代與對照組資本家的子女在綜合能力分數上沒有差別。

模型 8 投入文化資本變項，整體解釋力提升至 26%。除原本顯著變項依然維持顯著外，家長帶領活動（ $\beta = .06$ ）、家長投資才藝（ $\beta = .09$ ）與子代文化善意（ $\beta = -.06$ ）都達顯著。值得注意的是，家長投資才藝的影響還是大於家長帶領活動，以及子代文化善意呈負向預測力。

根據上述結果，假設三 A「子代的文化善意愈高，該學生在學校達成的綜合能力分數愈高」未獲支持，其結果是子代的文化善意愈高，綜合能力分數反而愈低。

（二）文化資本對導師評量的影響

表 4 模型 9 顯示整體模型共可解釋導師評量分數的變異量為 13%。達顯著變項由高而低包括男性（ $\beta = -.21$ ）、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beta = -.12$ ）、母親受教育年數（ $\beta = .10$ ）、單親或分

表 4

影響子代在校表現的迴歸分析結果摘要 (N=10,732)

	綜合能力分數				導師評量分數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B	β	B	β	B	β	B	β
男性 (對照女性)	-0.06	-.03***	-0.03	-.02*	-1.79	-.21***	-1.66	-.20***
學校所在地 (對照都市)								
城鎮	-0.08	-.04***	-0.08	-.04***	0.34	.04***	0.34	.04***
鄉村	-0.22	-.05***	-0.22	-.05***	1.14	.06***	1.15	.06***
家庭結構 (對照完整家庭)								
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0.76	-.17***	-0.73	-.17***	-2.39	-.12***	-2.29	-.12***
單親或分居家庭	-0.34	-.10***	-0.32	-.10***	-1.38	-.09***	-1.33	-.09***
兄弟姊妹數	-0.08	-.10***	-0.07	-.09***	-0.25	-.07***	-0.22	-.07***
族群 (對照閩南)								
客家	-0.09	-.03***	-0.09	-.03**	-0.10	-.01	-0.08	-.01
外省	-0.06	-.02*	-0.05	-.02*	-0.37	-.03**	-0.35	-.03**
原住民	-0.51	-.09***	-0.51	-.09***	-0.32	-.01	-0.35	-.01
父親受教育年數	0.05	.14***	0.05	.13***	0.15	.09***	0.12	.07***
母親受教育年數	0.06	.15***	0.05	.13***	0.18	.10***	0.14	.07***
家庭每月總收入 (取對數)	0.12	.09***	0.10	.08***	0.30	.05***	0.23	.04**
父親階級 (對照資本家)								
小雇主	0.03	.02	0.04	.03	0.16	.02	0.18	.03
小資產階級	-0.00	-.00	0.00	.00	0.12	.03	0.14	.04
專業經理人	0.01	.02	0.02	.02	0.14	.04*	0.15	.05**
專家與技術工人	0.01	.01	0.01	.01	0.14	.05**	0.15	.05**
經理人與領班	-0.00	-.01	-0.00	-.00	0.09	.05*	0.10	.05**
非技術工人	-0.01	-.04	-0.01	-.02	0.04	.03	0.06	.04
家長帶領活動	—	—	0.04	.06***	—	—	0.17	.06***
家長投資才藝	—	—	0.12	.09***	—	—	0.51	.08***
子代文化善意	—	—	-0.03	-.06***	—	—	-0.05	-.02**
Constant	-1.15***		-1.14***		12.42***		12.44***	
R ²		.25		.26		.13		.14

* $p < .05$. ** $p < .01$. *** $p < .001$.

居家庭 ($\beta = -.09$)、父親受教育年數 ($\beta = .09$)、兄弟姊妹數 ($\beta = -.07$)、鄉村 ($\beta = .06$)、家庭每月總收入取對數 ($\beta = .05$)、專家與技術工人 ($\beta = .05$)、經理人與領班 ($\beta = .05$)、專業經理人 ($\beta = .04$)、城鎮 ($\beta = .04$)、外省 ($\beta = -.03$)。父親階級位置變項中以專家與技術工人、經理人與領班、專業經理人此三者達正向顯著，說明導師評量分數會因特定父親階級而有差別。這些階級位置的共同特色為不具備生產工具的受僱者，但擁有較高教育程度、專門技術或管理權威。亦即擁有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在臺灣教育系統中似乎被賦予較低評價，而具備高教育，以及需通過考試或證照才能擁有專業技術職業則能獲得較高的評價。

模型 10 投入文化資本變項，整體解釋力提升 1%。其中，家長帶領活動 ($\beta = .06$)、家長投資才藝 ($\beta = .08$) 與子代文化善意 ($\beta = -.02$) 都達顯著。此模型中，家長投資才藝的效果依然大於家長帶領活動，而子代文化善意也還是呈現負向預測力。

綜合上述發現，假設三 B「子代的文化善意愈高，該學生獲得學校導師的評量分數愈高」同樣未獲支持。當子代的文化善意愈高時，學校導師的評量分數將會愈低。

(三) 文化資本對學術分流的影響

表 5 模型 11 為操作變項的基本模型。根據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可得知母親教育年數 ($\beta = .26$)、父親教育年數 ($\beta = .21$)、原住民 ($\beta = .09$)、家庭每月總收入取對數 ($\beta = .07$) 對子代學術分流有正向顯著的預測力，而兄弟姊妹數 ($\beta = -.08$)、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beta = -.08$)、單親或分居家庭 ($\beta = -.06$)、鄉村 ($\beta = -.06$) 等則有負向效果。⁶由於 Cox & Snell R^2 與 Nagelkerke R^2 值分別為 .15 與 .21，表示這些達顯著的變項與進入學術分流有中低強度的關聯。然而，本研究關注的父親階級位置卻未達顯著，代表各階級的子代進入學術分流的機率比與對照組資本家的子女沒有顯著差別。⁷

模型 12 是觀察投入文化資本變項對學術分流的影響。資料顯示家長帶領活動 ($\beta = .08$, $\text{Exp}(B) = 1.12$) 與家長投資才藝 ($\beta = .07$, $\text{Exp}(B) = 1.23$) 都達顯著且呈正向預測力，代表家長帶領活動與家長投資才藝愈多，其子女將有愈高的可能性進入學術分流。此時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家長帶領活動與家長投資才藝，學術分流的機會將分別提高 12% 與 23%。至於子代文化善意則未達顯著，顯示子代內化文化資本並不會影響學術分流的可能性。

模型 13 是檢驗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對學術分流的效力。資料顯示，綜合能力分數 ($\beta = .55$, $\text{Exp}(B) = 2.94$) 與導師評量分數 ($\beta = .31$, $\text{Exp}(B) = 1.15$) 的預測力皆達正向顯著，也就是綜合能力分數愈高及導師評量分數愈高時，該學生進入學術分流的可能性也愈高。

⁶ 邏輯迴歸可以藉由統計公式計算出類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值，即 $[(B \times S_x) / 1.8138]$ (王濟川、郭志剛，2008)。

⁷ 類似於線性迴歸係數，邏輯迴歸係數也可被解釋為對應自變項一個單位的變化所導致的依變項上之變化。但由於邏輯迴歸的依變項不是普通的連續變項，而是 logit (即對數勝算比 $\ln [p/(1-p)]$)，此時較方便的解釋是將迴歸模型等式兩側取自然對數，於是對數勝算比成為勝算比 ($p/(1-p)$)，其意義可理解為同一組事件中發生機率與不發生機率之間的比；當比值大於 1，代表事件更可能發生 (王濟川、郭志剛，2008)。

表 5

影響學術分流與否的邏輯迴歸分析結果摘要 (N=2,457)

	學術分流與否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B	β	Exp(B)	B	β	Exp(B)	B	β	Exp(B)
男性 (對照女性)	-0.01	.00	0.99	0.05	.01	1.05	0.15	.04	1.16
學校所在地 (對照都市)									
城鎮	-0.01	.00	0.99	-0.02	-.01	0.98	0.04	.01	1.04
鄉村	-0.51	-.06*	0.60	-0.50	-.06	0.61	-0.50	-.06	0.61
家庭結構 (對照完整家庭)									
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0.69	-.08*	0.50	-0.70	-.08*	0.50	0.06	.01	1.06
單親或分居家庭	-0.38	-.06*	0.68	-0.36	-.05	0.70	-0.06	-.01	0.94
兄弟姊妹數	-0.11	-.08*	0.89	-0.10	-.07*	0.91	-0.09	-.06	0.92
族群 (對照閩南)									
客家	-0.06	-.01	0.94	-0.51	-.01	0.95	-0.07	-.01	0.93
外省	-0.04	-.01	0.97	-0.04	-.01	0.96	-0.09	-.02	0.92
原住民	0.99	.09**	2.68	0.98	.09**	2.66	2.08	.20***	8.03
父親受教育年數	0.15	.21***	1.16	0.14	.19***	1.15	0.11	.15***	1.12
母親受教育年數	0.21	.26***	1.23	0.19	.23***	1.21	0.14	.18***	1.15
家庭每月總收入 (取對數)	0.19	.07*	1.21	0.16	.06	1.17	0.22	.08*	1.24
父親階級 (對照資本家)									
小雇主	-0.09	-.03	0.92	-0.07	-.02	0.93	-0.08	-.03	0.92
小資產階級	-0.08	-.05	0.92	-0.06	-.04	0.94	-0.09	-.06	0.91
專業經理人	0.01	.01	1.01	0.02	.01	1.02	-0.00	.00	1.00
專家與技術工人	0.01	.01	1.01	0.02	.02	1.02	0.01	.00	1.01
經理人與領班	-0.06	-.06	0.95	-0.05	-.06	0.95	-0.07	-.08	0.93
非技術工人	-0.03	-.06	0.97	-0.02	-.04	0.98	-0.03	-.05	0.97
家長帶領活動	—	—	—	0.11	.08**	1.12	0.10	.07*	1.10
家長投資才藝	—	—	—	0.21	.07**	1.23	0.08	.03	1.09
子代文化善意	—	—	—	-0.01	-.01	0.99	0.04	.05	1.05
綜合能力分數	—	—	—	—	—	—	1.08	.55***	2.94
導師評量分數	—	—	—	—	—	—	0.14	.31***	1.15
Constant	-3.50***			-3.57***			-5.46***		
-2LL	2,754.90			2,736.99			2,310.60		
Cox & Snell R^2	.15			.16			.29		
Nagelkerke R^2	.21			.22			.40		

* $p < .05$. ** $p < .01$. *** $p < .001$.

再進一步比較模型 12 與 13，整體模型解釋力由 21.9%提高為 40.4%，說明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此兩變項是影響進入學術分流的重要因素，共可解釋學術分流 18.5%的變異量，並以綜合能力分數的影響力較大。當中更重要的變化是家長投資才藝此變項的預測力由顯著轉為不顯著，代表家長投資才藝是透過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作為中介而對學術分流產生影響，此即間接影響效果。

根據上述討論，假設四 A「子代的文化善意愈多，其綜合能力分數愈高，進而導致教育分流時選擇學術分流的機會愈大」與假設四 B「子代的文化善意愈多，其導師評價分數愈高，進而導致教育分流時選擇學術分流的機會愈大」都被分析結果拒斥。雖然子代的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價分數愈高時，將有較大機率選擇學術分流，但其效果是來自親代文化資本，諸如家長帶領活動與家長投資才藝，而與子代文化善意無關。

伍、結論與討論

過去相關研究探討文化資本議題時，多就子代的學業成績或升學情況進行分析，這對理解文化資本在教育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依然缺乏具有說服力的證據。本研究認為，解答文化資本對教育的效力前，需先釐清文化資本從親代傳承到子代的過程，才能進一步澄清文化資本對子女教育的影響。立基上述問題意識，本研究使用 TEPS 釋出的國中學生、家長及導師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與「轉換」路徑

本研究提出文化資本的兩條內化路徑。第一是父母自身具備對文化資本的理解與認同而帶領子女參與相關文化活動，稱為「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路徑」。本研究預期文化資本愈高的社會階級，家長帶領子女參觀高雅文化活動的情形愈多。第二是家長透過支付學費的方式讓子女參加才藝課程，稱為「經濟資本的代間轉換路徑」。本研究預期經濟資本愈高的社會階級，家長投資子女參加才藝文化課程的情形愈多。藉由這兩條代間傳遞與轉換路徑，本研究預期父母的投入程度愈高，子女獲得的文化善意也會愈高。

首先，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支持文化資本的傳遞與轉換具有社會階級的區別效果。資料顯示親代文化資本較高的階級位置（如專業經理人、資本家、專家與技術工人、小雇主、經理人與領班）帶領子女參與高雅文化活動的情形比其他階級多，家庭經濟資本較高的階級位置（如資本家、專業經理人、小雇主）投資子女參加才藝文化課程的情形比其他階級多。若聚焦「擁有生產工具」的階級位置，發現有僱用員工的資本家與小雇主教育程度居中，但家庭收入豐富，因此同時採取文化資本的兩條內化路徑之情形皆高；反倒是未聘僱員工的小資產階級，也就是自營作業者，是臺灣社會中常見的黑手頭家，由於教育程度偏低、家庭收入不多、文化資本也相對不足，導致代間傳遞與轉換文化資本的情形皆少。若觀察「具備專門技

術」的階級位置，發現獲致高教育成就、通過考試或具備證照，且擁有管理權威的專業經理人也頻繁運用文化資本的兩條內化路徑，至於專家與技術工人、經理人與領班的教育程度尚可，但家庭收入較為不足，因此家長乃是採取帶領子女參與高雅文化活動的方式來傳遞文化資本給子代。

其次，本研究也證實文化資本傳遞與轉換能夠累積子代的文化善意。資料顯示，家長帶領子女參與高雅文化活動，以及家長投資子女才藝文化課程，都有助傳達文化資本為子代的文化善意。此結果說明臺灣社會中確實存在 Bourdieu 所關注的資本代間傳遞與轉換之可能性，親代的資本可藉此兩條路徑傳承文化資本給下一代。然而，超出本研究預期的是傳遞與轉換之後的子代文化善意並不存在階級的差異，臺灣社會中不同階級位置的子代所擁有之文化資本其實差距不大。此時，子代文化善意既不存在階級區別的效果，此現象也不會因家長帶領活動或家長投資才藝的增加而發生變化。⁸

二、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與「轉換」對子代教育成就的影響

上述結果只能證實臺灣社會存在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與轉換路徑，卻未能說明傳遞與轉換之後如何對子女教育成就產生影響。以往研究多推論習得文化資本的子女到學校後會展現他們的文化品味與慣習，進而被學校教師賦予較高評價，並經歷升學制度的優勢。假若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與轉換對教育成就具有影響力，本研究假設是由於子代文化善意促成子女的學業表現、學校教師的評價，以及隨後的學術分流。然而，研究結果未如預期，「親代文化資本是透過子代內化文化資本而影響子代的學業表現」此一假設未獲證實。

第一，資料顯示子代文化善意愈高，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反而愈低，也不會影響學術分流的機會；反倒是家長帶領活動與家長投資才藝愈多，其子女的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將會愈高，並有較高的機會進入學術分流。亦即，子代文化善意對於教育成就的影響其實並沒有想像中大。

第二，此時達到正向顯著的變項是家長帶領活動與家長投資才藝，以及父母教育年數與家庭每月總收入，前者兩種文化資本屬於親代擁有，後者則隱含著家庭的社經地位。因此，本研究認為父母如果希望提升子女的教育成就，則家長認同文化資本而展現出來的積極行動與態度，以及家庭背景的影響力會遠比子女內化文化資本與否來得更重要。

⁸ 當觀察表 2 與表 3，可以發現子代文化善意作為依變項的模型解釋力遠低於親代文化資本作為依變項，且子代文化善意不存在階層差異。雖然這個發現不會影響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但卻點出了研究限制與未來可行的研究方向。第一，本研究所使用的文化資本變項包含「家長帶領活動」、「家長投資才藝」與「子代文化善意」等，受限於 TEPS 的問卷設計，各自都只能找到兩個題目來做測量，可能造成低估這些文化資本的影響或被影響效果，甚至「子代文化善意」未達統計顯著的原因。第二，或許正是由於過去研究相當少見以子代自身的文化資本作為依變項，所以 TEPS 問卷才不容易找到相近的問卷題目。據此，本研究認為若能持續深入探討「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與轉換對教育成就的影響」此議題，將有助於豐富文化資本研究的學術成果。惟影響子代文化資本的因素可能不僅只是本研究所投入的家庭背景變項，必須更貼近青少年的特質，例如同儕與大眾傳媒的效應等，或許能獲得更佳的統計效果。

本研究認為這樣的發現並沒有悖離既有學術成果，反而再次支持親代文化資本對子代教育成就的重要性。進一步言，此結果也更深入說明臺灣社會中文化資本代間傳遞與轉換的獨特意義：當文化資本確實轉換到子女身上而以子代文化善意展現時，其作用與親代文化資本的效果相反，並非如家長期望般的提高在校表現優勢，以及促進學術分流。因此，將文化資本藉由傳遞與轉換路徑而傳承給下一代，以及期望子女獲得文化資本而取得高教育成就，實屬兩件不同的事情。但臺灣社會卻存在迷思，誤認為家長只要提供豐沛的文化資本給子女，子女就能夠內化文化資本而獲致較高的教育成就，並取得進入上階層的入場券。

據此，本研究整理出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與轉換對子代教育成就的因果關係：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較高的「特定階級位置」將具備較高程度的家長帶領活動與家長投資才藝，藉由這些「親代文化資本」的投入能讓子女取得較佳的「綜合能力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進而促成教育分流時有較高的機率進入「學術分流」。在此過程中，家長投資才藝的影響大於家長帶領活動，但家長帶領活動對學術分流具備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力，家長投資才藝則是透過在校表現作為中介而對學術分流產生間接作用，至於子代文化善意則與學術分流無關。

三、文化再製及其效力

根據前述討論，臺灣社會中的文化資本存在明顯的階級差異。首先，西方社會習以為常的文化活動，即出席高雅文化，如音樂會、美術館、博物館等，在臺灣的教育成就取得過程中並未獲得同等的重視。雖然這些文化活動表面上是對所有人開放，但本研究結果卻顯示只有特定階級位置會前往參觀，這群文化善意較多的參與者都是來自文化資本相對較高的階級。他們看待文化資本具有較高的認同與接受程度，並積極帶領子女參與文化活動，以期望提高子女的文化善意。其次，才藝補習是臺灣教育體制下的另一種獨特現象，經濟資本較高的階級位置也會投資較多的經濟資本讓子女參加各種才藝課程，如音樂、舞蹈、繪畫等。家長會期待透過投資子代才藝來彰顯、培養階層的品味，也藉由學習而涵養對高雅文化的鑑賞能力，從而累積文化資本。對上述這群家長而言，這是面對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不對稱時發展出來的一種策略，由於擁有比其他階級豐富的經濟資本或者文化資本，藉由代間傳遞與轉換路徑而積極投資子代豐富的文化資本，期望下一代能夠更上一層樓。

因此，家長傳承文化資本的目的可能是希望讓子女在多元升學制度下獲得額外加分，但本研究卻也證實臺灣的升學制度較不強調階層文化的象徵性、也不重視文化鑑賞能力是否內化為子代的日常秉性。一方面，當家長致力傳承文化資本給下一代時，能夠憑藉帶領子女參與文化活動，或者投資子代才藝課程等兩條路徑，讓子女內化對高雅文化的親近性，這是一種文化再製的現象，涉及特定階級的家庭運用身體化文化資本與客體化文化資本傳承為子代文化善意的過程。Bourdieu 的文化再製論點對於臺灣教育場域的文化再製現象具有解釋力。但另一方面，子代內化文化資本卻無助於在教育過程中取得優勢，具備高文化善意的子代未必同

樣獲得高教育成就；在升學主義下的臺灣，影響子女學業表現的因素，最終還是來自家庭所屬的社經地位與親代文化資本的效力。本研究認為，此結果係來自於臺灣教育制度過度重視智育的表現。由於偏重升學課程與學業成績，與升學考試息息相關的語文、數理能力備受重視，而與升學考試無直接相關的科目如藝術、美學教育等相對被忽視。也由於子代文化資本的展現往往必須分散學習者對智育表現的專注力與時間運用，臺灣獨特的教育環境使得子代文化資本削弱綜合能力與導師評量等的在校表現，導致對學術分流的效用有限。

總之，本研究的貢獻是應用 Bourdieu 文化資本的概念，落實在臺灣教育現場的實證調查資料而加以分析，研究發現雖然文化再製在臺灣社會仍然具有解釋效力，可是影響國中學生教育成就的方式其實還是藉由親代文化資本而促成學業綜合分數與導師評量分數。在此脈絡下，家庭所屬的社經地位仍然具有核心作用。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王濟川、郭志剛（2008）。**Logistic 迴歸模型—方法及應用**。臺北市：五南。

【Wang, J.-C., & Guo, Z.-G. (2008).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Taipei, Taiwan: Wu-Nan Book.】

李文益（2004）。文化資本、多元入學管道與學生學習表現—以台東師院為例。**臺東大學教育學報**，**15**（1），1-32。

【Lee, W.-I. (2004). Cultural capital, multiple entrance paths and student academic performance—A study of the National Taitung Teacher's College. *NTTU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5(1), 1-32.】

李文益、黃毅志（2004）。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學生成就的關聯性之研究：以台東師院為例。**臺東大學教育學報**，**15**（2），23-58。

【Lee, W.-I., & Hwang, Y.-J. (2004). The study on relationship among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students' achievement: An example of National Taitung Teachers College. *NTTU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5(2), 23-58.】

李佩嫻、黃毅志（2011）。原漢族群、家庭背景與高中職入學考試基測成績、教育分流：以臺東縣為例。**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6**（1），193-226。doi:10.3966/2073753X2011035601007

【Lee, P.-H., & Hwang, Y.-J. (2011). Aborigines and Hans,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basic competence test, and educational tracking: A study in Taitu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56(1), 193-226. doi:10.3966/2073753X2011035601007】

李鴻章（2006）。臺東縣不同族群學童數學學業成就影響模式之探討。**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6**（2），1-41。

【Lee, H.-C. (2006). An exploration of models of mathematics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different ethnical schoolchildren in Taitung county.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2), 1-41.】

宋曜廷、周業太、曾芬蘭（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入學考試與評量變革。**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9**（1），1-32。doi:10.6209/JORIES.2014.59(1).01

【Sung, Y.-T., Chou, Y.-T., & Tseng, F.-L. (2014). Standards-based assessments for 12-year basic educ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59(1), 1-32. doi:10.6209/JORIES.2014.59(1).01】

巫有鑑（1999）。影響國小學生學業成就的因果機制：以臺北市和臺東縣作比較。**教育研究集刊**，**43**，213-242。

【Wu, Y.-I. (1999). Mechanism affect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chievement: A comparison between Taitung county and Taipei municipality.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3, 213-242.】

林大森（2002）。高中／高職的公立／私立分流對地位取得之影響。**教育與心理研究**，**25**（1），35-62。

【Lin, T.-S. (2002). The effect of academic/vocational public/private tracking in status attain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25(1), 35-62.】

林宗弘（2009）。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1992-2007。**臺灣社會學刊**，

43, 93-158。

【Lin, T.-H. (2009). Post-industrializing Taiwan: Changing 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inequality, 1992-2007.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3, 93-158.】

林松齡 (1999)。母親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文化資本、經濟資源、與監督角色的比較。臺大社會學刊，27，71-105。

【Lin, S.-L. (1999). The effects of mother on her children's school performance: The comparisons of cultural capital, economic resources, and supervisory rol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 27, 71-105.】

張芳全 (2006)。社經地位、文化資本與教育期望對學業成就影響之結構方程模式檢定。測驗學刊，53 (2)，261-295。

【Chang, F.-C. (2006). Explore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 aspir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sychological Testing*, 53(2), 261-295.】

許崇憲 (2002)。家庭背景因素與子女學業成就之關係：臺灣樣本的后設分析。中正教育研究，1 (2)，25-62。

【Hsu, C.-S. (200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ial background and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means of meta-analysis in Taiwan. *Chung Cheng Educational Studies*, 1(2), 25-62.】

陳怡靖、黃毅志 (2011)。學科補習、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高中多元入學關係之研究。教育研究學報，45 (2)，87-111。

【Chen, Y.-G., & Hwang, Y.-J. (2011).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ram schooling,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multiple entrance program of senior high school. *Journal of Education Studies*, 45(2), 87-111.】

陳怡靖、鄭耀男 (2000)。臺灣地區教育階層化之變遷－檢證社會資本論、文化資本論及財務資本論在臺灣的適用性。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10 (3)，416-434。

【Chen, Y.-G., & Cheng, J.-N. (2000). The changing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Taiwan area: To explore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of fit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O.C.,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0(3), 416-434.】

黃芳銘、楊金寶 (2002)。國中生家庭階級影響偏差行為模式之研究。師大學報：教育類，47 (2)，203-230。doi:10.3966/2073753X2002104702005

【Hwang, F.-M., & Yang, K.-B. (2002).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amily class on deviant behavior. *Journal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47(2), 203-230. doi:10.3966/2073753X2002104702005】

黃毅志 (1998)。臺灣地區新職業分類的建構與評估。調查研究，5，5-32。

【Hwang, Y.-J. (1998). The co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new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Taiwan. *Survey Research: Method and Application*, 5, 5-32.】

黃毅志 (2003)。「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與教育社會學研究本土化。教育研究集刊，49 (4)，1-31。

【Hwang, Y.-J. (2003). The co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new occupational prestige and socioeconomic scores for Taiwan":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research.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9(4), 1-31.】

黃毅志 (2008)。如何精確測量職業地位？「改良版台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臺東大學教育學報，19 (1)，151-160。

- 【Hwang, Y.-J. (2008). How to precisely measure occupational status?—Constru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edition of new occupational prestige and socioeconomic scores for Taiwan”. *NTTU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9(1), 151-160.】
- 黃毅志 (2011)。臺灣的教育分流、勞力市場階層結構與地位取得。臺北市：心理。
- 【Hwang, Y.-J. (2011). *Education tracking, labor market class structure and status attainment in Taiwan*. Taipei, Taiwan: Psychological.】
- 蔡瑞明 (2008)。台灣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研究：一個倒 U 字形的發展趨勢。載於謝國雄 (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 (pp. 137-175)。臺北市：群學。
- 【Tsay, R.-M. (2008).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A development trend of inverted U. In G.-S. Shieh (Ed.), *Interlocution: A thematic history of Taiwanese sociology, 1945-2005* (pp. 137-175). Taipei, Taiwan: Socio.】
- 楊孟麗、譚康榮、黃敏雄 (2003)。心理計量報告：TEPS 2001 分析能力測驗。臺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Yang, M.-L., Tan, T., & Huang, M.-H. (2003). *Psychometric report: The test of analysis capability in TEPS 2001*.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2004)。第一波 (國中／高中／高職／五專) 資料使用手冊。臺北市：作者。doi:10.6141/TW-SRDA-C00124_1-1
-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2004). *The wave 1 (junior high school/senior high school/vocational high school/five-year program) information manual*. Taipei, Taiwan: Author. doi:10.6141/TW-SRDA-C00124_1-1】
- 謝志龍 (2009)。家庭內的隱形不平等：手足成就差異的社會學分析 (未出版博士論文)。東海大學，臺中市。
- 【Hsieh, C.-L. (2009). *Invisible inequality at hom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mong sibling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 謝志龍 (2014)。家長參與對國中學生教育成就之影響：社會資本的觀點。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4 (1)，93-134。doi:10.3966/168020042014061401003
- 【Hsieh, C.-L. (2014).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schooling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4(1), 93-134. doi:10.3966/168020042014061401003】
- 劉正 (2006)。補習在臺灣的變遷、效能與階層化。教育研究集刊，52 (4)，1-33。
- 【Liu, J. (2006). The transition, efficacy, and stratification of cram schooling in Taiwa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2(4), 1-33.】
- 蘇船利、黃毅志 (2009)。文化資本透過學校社會資本對臺東縣國二學生學業成績之影響。教育研究集刊，55 (3)，99-129。
- 【Su, C.-L., & Hwang, Y.-J. (2009). Influence of cultural capital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through school social capital: A study of eighth graders in Taitung.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5(3), 99-129.】
- 蘇國賢 (2008)。台灣的所得分配與社會流動之長期趨勢。載於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 (主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臺灣社會* (pp. 187-217)。臺北市：群學。
- 【Su, K.-H. (2008). The long term trend of income allo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In H.-Z. Wang, K.-C. Li, & I.-H. Kung (Eds.), *Step in forbidden zones: Twenty year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1987- 2008)* (pp. 187-217). Taipei, Taiwan: Socio.】

蘇國賢 (2011)。階級與階層。載於王振寰、瞿海源 (主編), *社會學與台灣社會* (pp. 103-127)。臺北市: 巨流。

【Su, K.-H. (2011). Social classes and stratification. In J.-H. Wang & H.-Y. Chiu (Eds.), *Sociology and Taiwan* (pp. 103-127). Taipei, Taiwan: Chuliu.】

蘇國賢、喻維欣 (2007)。臺灣族群不平等的再探討：解釋本省／外省族群差異的縮減。臺灣社會學刊, 39, 1-63。

【Su, K.-H., & Yu, W.-H. (2007). When social reproduction fails: Explaining the decreasing ethnic gap i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9, 1-63.】

二、外文文獻

Barker, C. (2004).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UK: Sage. doi:10.4135/9781446221280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80/10286630902952413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60). New York, NY: Greenwood Press.

Bourdieu, P., & Passeron, J.-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Beverly Hills, CA: Sage. doi:10.1080/0305006780140109

Bourdieu, P., & Wacquant,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 Graaf, P. M. (1986).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9(4), 237-246. doi:10.2307/2112350

DiMaggio, P.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47(2), 189-201. doi:10.2307/2094962

DiMaggio, P., & Mohr, J. (1985). Culture capit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marital sel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6), 1231-1259. doi:10.1086/228209

DiMaggio, P., & Useem, M. (1978). Cultural democracy in a period of cultural expansion: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arts audiences o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Problems*, 26(2), 180-197. doi:10.1525/sp.1978.26.2.03a00060

Dumais, S. A. (2002). Cultural capital, gender and school success: The role of habitu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1), 44-68. doi:10.2307/3090253

Farkas, G., Grobe, R. P., Sheehan, D., & Shuan, Y. (1990). Cultural resource and school success: Gender, ethnicity, and poverty group within an urban school distric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1), 127-142. doi:10.2307/2095708

- Grusky, D. B. (2001).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ocial inequality. In D. B. Grusky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pp. 1-54). Boulder, CO: Westview.
- Kalmijn, M., & Kraaykamp, G. (1996). Race,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ing: An analysis of trends in United Stat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9(1), 22-34. doi:10.2307/2112721
- Lamont, M., & Lareau, A. (1988).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 6(2), 153-168. doi:10.2307/202113
- Orr, A. J. (2003). Black-white differences in achievement: The importance of wealth.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6(4), 281-304. doi:10.2307/1519867
- Roscigno, V. J., & Ainsworth-Darnell, J. W. (1999). Race,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and achievement return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2(3), 158-178. doi:10.2307/2673227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2016, 61(3), 163-195

doi:10.6209/JORIES.2016.61(3).06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and Conversion of Cultural Capital on th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hih-Lung Hsieh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Chih-Chia Chu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Most studies on cultural capital have analyzed only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r further schooling of participants. However, these analyses have failed to provide convincing evidence elucida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education. This study argued that the process of parent-to-progeny transfers of cultural capital must be clarified before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capital on th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of children can be determined. Data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released in th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were adopted for analysis.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at parents can transfer cultural capital (and converted economic capital) to their children, which is then reflected in the goodwill of their children toward high culture. Bourdieu's concept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was used to explain the condition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in Taiwan. However, the cultural goodwill of children negatively influenced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scores and evaluations of them conducted by teachers; furthermore, cultural goodwill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ntrance of these students into academic senior high schools. These results might stem from an overemphasis on intellectual performance in the Taiwanese educational system, in which the demonstration of cultural goodwill by children frequently diverts their attention and reduces the amount of time they spend in the pursuit of high intellectual performance.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uniqu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Taiwan has limited the effects of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Chih-Lung Hsieh, E-mail: sl.jung72@g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Jul. 17, 2015; Revised: Dec. 7, 2015; Accepted: Jan. 12, 2016.

internalized cultural capital of children on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Keywords: culture capital, cultural reproducti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social class

